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四五四期 ——
(二〇〇五年九月六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0509b)

【千秋功罪】汪东兴的一部充满谎言的书 (二)	仰天长啸
【人物春秋】试论文革中毛泽东、周恩来、林彪和江青的角色	游 侠
【难忘岁月】《风雨人生路》摘载 (之十)	刘文忠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以纯文本形式投寄 hwxz@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千秋功罪】

汪东兴的一部充满谎言的书 (二)

——评《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

• 仰天长啸 •

毛泽东《我的一点意见》一文发表后，到会的中央委员感到紧张，感到困惑。恩格斯说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是一部天才的著作，毛泽东冷言道：这本书不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毛说他与陈伯达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从来没有配合过。历史上很难有人在毛泽东身边工作 30 多年，毛与陈共事 30 多年，就证明他们配合得很好；如果配合的不好，不可能共事 30 多年。周恩来曾说过：“伯达同志最能准确地表达毛泽东思想。”

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很多中央委员，包括吴、叶、李、邱都发了言，表示拥护林的讲话，表示拥护设国家主席（黄、吴、李、邱没提），表示“天才”的观点是正确的，结果都被装进毛泽东的套子里。这时汪东兴开始检讨了，汪在检讨中胡编乱造，推诿卸责地说了几句。毛泽东却对汪东兴的检讨表示满意，予以通过。而吴法宪的检讨尽管比较深刻（吴法宪的检讨稿是吴、李、邱三人共同起草的，然后他们到周总理处，周总理看了一遍后，与他们一边议，一边亲自动手帮吴法宪修改，最后才定稿。周总理语重心长地说：“照稿子念吧，你们几个人政治上一直都很顺利嘛，要经得起挫折”）。毛泽东逐段批示，不予过关。陈伯达的检讨稿，是周恩来、康生帮助搞的，基调是康生定的，在会上，是周恩来帮陈伯达念的（因陈口音太重，听不懂），毛

泽东也不予通过，反决定对其审查〔45〕。

黄永胜是后上山的。当时小组会发言早已停止，毛泽东《我的一点意见》一文已发表过了。黄永胜根本没有在会上发言，黄上山是在全会上做《关于加强战备的报告》，却也被责令检讨。说黄在思想上与吴、叶、李、邱是一致的，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别人脑子里怎么想的，你也知道？也太“洞察一切”了。

毛泽东在会上说：“他们（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是手无寸铁的哟，你们有飞机、大炮，有原子弹，你们能不能再让我看张春桥三年，不要急于下结论。

黄永胜说：“群众意见很大。”

毛泽东说：“什么群众！？不就是文化革命中受了委屈的人嘛，还有你们几员大将。”黄、吴、李、邱不语。

毛泽东说：“文化大革命是我搞起来的，九大路线是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你们为什么不团结起来批判刘少奇？”

黄、吴、李、邱是毛泽东带出来的兵，他们是拥戴毛泽东的。毛泽东没有估计准这一点，他认为反张春桥就是反毛本人，这就大错特错了！

9月1日，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扩大到各省、市，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由林彪主持。在毛泽东的指示下，要陈伯达、吴法宪在会上作检讨。毛说：凡是在这次庐山会议上发言犯了错误的人可以做自我批评、检查。

陈伯达检讨时，周总理刚想为陈伯达翻译，这时张春桥主动说：“我来翻译。”周总理淡淡一笑，就随他去吧。陈伯达发完言，张春桥又肆无忌惮地批判了陈伯达。到会人员感到特别沮丧。在会场上林彪、周恩来反成了陪衬，张春桥的声音占据了整个会场。

吴法宪检讨完后，张春桥又颐指气使地说：“以吴法宪为戒，努力学习，努力工作。”这种话本应是林彪、周恩来站在领导角度说的，张春桥竟大言不惭地在讲。会场上毫无反应，没人讲话。

8月26日毛泽东宣布休会几天后，并没有理睬林彪，更没有和林彪商量工作。毛泽东是听进了，听信了江青的话，坚决给张春桥作后台。毛泽东频频找江青、康生、周恩来等谈话。林彪知道得很清楚，他内心很失望，也很平静，不动声色。林彪对吴、李、邱表示：我不同意毛主席对张春桥的庇护，也不干扰毛主席对问题的处理。毛泽东见林彪毫无反应，则给林出了一个难题：叫林组织陈伯达、叶群、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汪东兴开会。林彪没有推脱，而是同意了。

从9月2日开始，林彪召集陈伯达等六人在林的住处开了三次会。林说：“主席要我同你们各位谈谈，做点思想工作，每次会议的情况请汪东兴向主席报告。我就不另写书面报告了。”大家知道汪东兴已经叛变了，不敢多讲，各自拿着《我的一点意见》在看，然后一言半句地讲了一些。汪东兴根本没有发言。

汪书第51页写到：“我发了言，批判了陈伯达。我指出华北组的讨论，就是陈伯达放炮后搞乱的。林彪听了，表情很尴尬。”

这纯粹是谎言！华北组是你汪东兴放炮后，才热闹起来的。华北组的第二号简报，大部分都记录着你汪东兴精彩的发言。当时陈伯达仍是政治局常委，毛主席还没有宣布打倒他，你当

着陈伯达的面，敢当面说谎吗！？林彪有什么尴尬的？尴尬的应该是你自己！

第二次开会是在9月3日。汪东兴做贼心虚，怕追问他在华北组的发言是不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高指示”，没有参加会议。吴法宪打了几个电话，根本找不到人。会议开了一会就结束了。

汪东兴在检讨中说陈伯达有野心，“要夺毛主席的权，实行资产阶级专政”（汪书第60页，汪东兴的第二次书面检讨）你给陈伯达栽什么赃，造什么谣不好！？说陈伯达“要夺毛主席的权”，简直是天方夜谭，这纯属扯淡！

汪东兴还说：“我怀疑陈伯达事先看过修改过华北组的简报，他利用简报来扩大到各组煽动欺骗人。我建议中央派人追查陈伯达……，我看有阴谋，有鬼”。汪东兴既是会务组的又是中央办公厅主任，也很会来事，这种事只有你汪东兴会干也有条件干；陈伯达既不是会务组的又不是中央办公厅主任，他是个书呆子，他不会干也没有条件干。汪东兴竟向中央提出这种问题，真是品质恶劣，灵魂肮脏到难以想象的地步！

汪东兴在贼喊捉贼。华北组的二号简报（即九届二中全会的六号简报）二十四日晚上，大会简报组派往华北组的工作人员整理出来后，请汪东兴审阅。汪对工作人员说，直接送伯达同志处。陈伯达定稿后，交给工作人员，工作人员又送到华北组组长李雪峰同志手上。这时已经十一点多了，李和吴德、解学恭吃完夜宵，正准备回去休息，李雪峰的黄秘书拿着简报的文稿到了，正巧这时有一个电话也打到了李处（请问汪东兴，这个电话是谁打的呢？）李雪峰接完电话，不情愿地叫组长吴德、解学恭签字后，交给工作人员。简报连夜付印，第二天一清早就发送到各组。那么，是谁让工作人员拿着稿子转呢？李雪峰“交差”以后，是谁让连夜付印呢？付印前是要会务组负责人签字的，谁签的？当时已经十二点多了，是谁奉谁的指示送到铅印室付印的？

汪东兴为什么要慷慨激昂地发言并串联、煽动别人发言，他的目的有两个：一个是你开始要做一个坚决的林彪分子，做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做一个真正的老干部。林彪在8月23日开幕式的讲话中，不点名的点了张春桥，与会的中央委员听了林彪的讲话大为振奋。出于对中央文革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一伙的憎恨，大家都以为，这次至少张春桥的末日到了，汪也以为林彪能打败江青、张春桥，为民除害。你也非常希望打到张春桥。为了让更多的中央委员发言声讨张春桥，你在华北组认真地先行发了言。第二：你是一个坚决的毛泽东分子，为毛泽东主席个人的意愿（在毛泽东的晚年，在文革中，毛的意愿大部分是错误的），牺牲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百分之百效忠服务的人。你为毛泽东施了“苦肉计”，为毛泽东做了一个“托”，设了一个套。你把大家都“涮”了。把林彪，把黄、吴、李、邱，把大多数中央委员，把大多数军队干部套进去，从而让毛泽东继收拾彭德怀、收拾刘少奇后，再收拾林彪。

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没有人改变大会的议事日程，事事（包括讨论林副主席的讲话）都是政治局决定并报毛泽东同意的。但8月26日以后，大会的议程就被毛泽东彻底改变了。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各小组开始批判陈伯达。陈伯达只是一介书生，也是手无寸铁的。批陈没有什么批头，人们心里明白，对毛泽东只能听之任之了。（在这里我们要指出：我们决不否认陈伯达在文革初期按毛的意图说过不少错话，办过一些错事。但陈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发言毫无政治上、组织上的错误。在党的会议上，一个中央委员，还是政治局常委，在小组会上发言是应有的权利！难道必需按毛的意愿发言才算正确？是大会决定讨论林副主席的讲话，事前还听了两遍录音。）

在九届二中全会闭幕式前，毛泽东又召集会议，会上毛泽东对陈伯达说：“你陈伯达闭幕式

不要参加了，不然大家会把你从台上赶下去。”陈伯达当时非常窘迫，怏怏不乐地退出会场。尔后，毛泽东又说：“我向中央报告，我要揭发陈伯达，陈伯达的历史我和康老最清楚。陈伯达是个托派……陈伯达出生在一个封建官僚家庭，陈伯达有变节行为，一九三一年被捕叛变，成了特务。他一贯追随王明反共……。”毛泽东的发言，使大家感到很不是滋味。过去，陈伯达号称马列主义理论家，在毛主席身边工作30多年，周恩来说：“把毛泽东思想领会得最好，从理论上阐述和宣传得最好，这就是我党杰出的理论家陈伯达同志（46）”。

前几天，陈伯达还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现在又是“托派”又是“变节”，有错误可以检讨嘛。怎么一得罪，动不动就搞成了这个样子？张春桥也是叛徒，为什么一字不提！？为什么林彪代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揪真正的叛徒、反共分子、祸国殃民的张春桥，就是分裂党？毛泽东代表自己的利益，揪与其共事三十多年的中央政治局常委陈伯达就是团结的大会？为什么大会讨论林副主席的讲话，就是改变大会的议事日程（林是在大会上公开讲话的，周恩来总理领导的政治局决定讨论的），大会学习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毛是在家里写的）不也是改变大会议事日程嘛！我们号称“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是党正确，还是只有毛泽东一人正确？听了毛讲完话后，人人头大。毛泽东指责别人，改变大会议事日程，结果毛把大会议程彻底改变了，毛泽东指责别人想揪出张春桥，结果毛把党中央的第四号人物陈伯达揪出来了。毛泽东主席在九届二全会上，唯我独自尊贵，唯我独自正确，翻手为云，覆手为雨；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任意破坏党章、宪法，表现得淋漓尽致。毛泽东已经很自觉地站在党和国家之上了，毛泽东把无数革命先烈流血牺牲，千千万万革命前辈英勇奋斗创建的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共和国攫为己有，成为按照他个人意愿办一切事情的工具。康生在九届二中全会以后一直称病不出，伴君如伴虎，一点不假。

9月6日上午，召开了全体会议，全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通过了《中央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的关于在适当的时候召开四届全国人大的建议》；批准了周恩来总理做的《国务院关于全国计划会议和1970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批准了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做的《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战备工作的报告》。

9月6日下午，九届二中全会闭幕。毛泽东主席在会上神侃了一通。指责陈伯达黑秀才，大家上了黑秀才的当。暗指张春桥是红秀才，公开在会上给张春桥撑腰打气。接着毛泽东又用强加于人的惯用手法，毛说：“他们认为，代表人民的标志就是要当国家主席。我在十几年前就不当了嘛，岂不是十几年以来都不代表人民了吗？我说，谁想代表人民，你去当嘛，我是不干，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干。你有啥办法呀？”请注意，毛泽东直到闭幕式上，也只是说自己不当“国家主席”，并没有说“不设国家主席”。

事实上，谁也没说过“代表人民的标志就是要当国家主席”，大家提议设国家主席的目的，是为了健全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体制。毛泽东主席在刘少奇及国家主席问题上“有病”，“心虚”，他不想让林彪当国家主席，他怕林彪当国家主席，才胡编乱造一顿。设不设国家主席是国家体制。毛泽东却偷换概念，说当不当国家主席，是代不代表人民的标志。不当国家主席，当然可以代表人民，但不设国家主席，就是国家体制不健全。著名民主人士梁漱溟先生在1970年全国政协机关小组讨论宪法修改草案时就提出：“比如设国家主席，一国的元首，不能没有。设国家主席是一回事，谁当国家主席是一回事，国家主席不可不设，什么人当国家主席可以通过法定手续来定。”毛说：“把庐山炸平，我也不干。你有啥办法？”是呀，全体中央委员一点办法也没有，党中央一点办法也没有，毛泽东是老大。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当年的现实。

在闭幕式上，周恩来还代表毛泽东宣布对陈伯达进行审查（毛个人定的，没有通过常委会和政治局。犯了错误检讨，是党内问题；先把人抓起来后定罪，是法制问题。这也是建国以来，

毛泽东在党内问题上制造的祸根)。9月6日晚，中央政治局举行了简短会议，周总理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庐山的问题不下山，传达会议精神要控制范围。回到北京后，政治局举行一次学习生活，各自做自我批评。‘孔夫子打拳，和为贵’。”康生则提出：“庐山的问题并没完，要追查到底，落实到人头，这样才能彻底解决问题。”周恩来只说了一句“应照主席指示办”，就散会了。大家都很遵守党的纪律、党的决定，只有毛泽东一下山还是讲个不停，从长沙讲到武汉，从武汉讲到北京丰台，致使吴德都得出一个结论：“陈伯达后面还有人……我想到了林彪。(47)”

全会闭幕了，服务员在打扫会场的卫生时，竟然从地上还拾到“打倒张春桥——几个中央委员”的条子。周恩来看到条子后，非常感慨，为了一个叛徒特务，一个阶级异己份子，一个在文革中支持打砸抢、支持向共产党夺权的大造反派张春桥，竟然打击了跟随毛一生，南征北战，出生入死，一身战功、一身枪伤的林彪，究竟是为了什么？毛泽东看到条子后，非常吃惊：我的态度那么鲜明，张春桥是红秀才，怎么还有此类条子出现？

9月6日晚，叶群非要林彪去见江青。林彪正气不打一处来，顺手给了叶群一耳光。叶群非常诚恳地哭着说：“一〇一，我非常对不起你和几个老总。我们都上了汪东兴的当。主席和江青的关系不是不好，而是很好。这次就是很好的证明。他宁愿不给你面子，也要给江青面子，去保张春桥。你要求见主席，他又不见。你的诚心他并不知道嘛，因此，这次一定要去，去是给主席看的。”林彪终于服从了叶群的意见，只说了一句：“主席是好心当成驴肝肺。”林到了江青处，一句话也没说。叶群则连连说上了陈伯达的当。

叶群从江青处出来，又给吴法宪打电话，叫黄、吴、李、邱也去看望一下江青。吴说，他们可能不愿意去。叶群说，林都去了嘛，去做做样子嘛。

黄、吴、李、邱到了江青住处，足足等了半个小时，江青才从楼上下来，而且穿着一件睡衣，四个老总真是窝火。江青象女皇一样，边走边说：“我向来是反对陈伯达的，你们又不是不知道。现在舒服了吧，过去你们不听我的话，犯了错误，今后听我的话就是了。主席和我对你们的态度还是和过去一样的。”四个老总从江青家出来，异口同声地说：“戏子，戏子！真他妈窝囊。”

9月7日，林彪下山了。周恩来去看望林彪，两人紧握双方的手，挚眼相对，一句话也说不出，一句话也不能说。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下到九江机场与林彪送别，在飞机上大家合影留念。林说：“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照常吃饭，照常睡觉，照常工作，最多是个彭德怀第二。你们有事情直接向周总理请示报告。”

九届二中全会结束，与会者陆续下山了。

周总理九月九日上午下山。

毛泽东九月九日下午下山。

毛泽东走在所有中央委员之后。毛泽东知道，虽然江青、张春桥得意了，认为他们胜利了，但毛泽东内心阵阵苦涩，他以否定林彪的正确意见为代价，以否定四个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正确意见为代价，以否定政治局大多数同志的正确意见为代价，以否定二百多个中央委员的正确意见为代价，换取了江青、张春桥的“安全”，这种代价也太大了。毛泽东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什么事都能做到。当时，毛泽东并不是汪东兴所说的什么“伟大领袖洞察一切”，而是错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反对江青、张春桥就是反对我毛泽东，反对江青、张春桥就是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我的命根子。

◇ “设国家主席”和“天才论”问题

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在江西省庐山召开了中国共产党九届二中全会，会议其中的一项议程是讨论在即将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准备通过的《宪法修改草案》。此前，在《宪法修改草案》中设不设国家主席及在《宪法修改草案》序言中，对毛泽东主席的评价用不用“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三个副词和“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等提法，引发了一场风波。这场风波的背后是一场反对还是维护江青、张春桥这些在文革中支持造反夺权的领军人物，反对还是拥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严重斗争。汪东兴的错误就是仍然以毛泽东的“两个凡是”来衡量三十几年前，关于设不设国家主席一事。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汪东兴仍然认为毛泽东的错误是正确的。

1969年，党的“九大”召开以后，毛泽东主席提出，准备召开四届人大。在四届人大召开之前，要解决修改宪法的问题。因为毛泽东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在《宪法修改草案》的序言中，必定要有对毛泽东颂扬的评价。在文革中，对毛泽东的评价、赞扬，最“标准”、最“流行”的提法，就是林彪同志在《〈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中所说的“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为了这“三个副词”和“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等提法，军委办事组的吴法宪和中央文革的张春桥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当时，中央成立了一个宪法起草小组，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吴法宪、李作鹏、纪登奎等人都在其中。在九届二中全会召开的前十天，即8月13日，中央修改宪法工作小组召开会议，讨论宪法草案讨论稿。由康生主持会议，（汪东兴谎称这次会议是政治局会议，说陈伯达也参加了会议，而且和吴法宪一起制造事端。汪书第18页）。会上，张春桥和吴法宪就宪法讨论稿中有些提法发生了争议，张春桥按照毛泽东主席的授意提出，把宪法草案讨论稿中“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等词句删掉。张说，毛主席曾说过“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个讽刺，赫鲁晓夫也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吴法宪则反对，吴认为毛主席的说法是自己的谦虚，在宪法上对毛泽东的评价应以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愿望为准，他告诉张春桥“要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张春桥认为毛泽东曾在“九大”政治报告中删掉过三个副词现在又写上违背毛主席的指示，以此来引吴法宪上钩。尤其是，《〈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的起草，张春桥也参加了，并积极推崇使用“三个副词”，现在又要求删掉，有些无理取闹。吴法宪不知是计，和张春桥争得很厉害，两人都动了气。会后，吴法宪报告了周恩来总理，周听后对张春桥很生气，对吴法宪的意见表示支持。吴法宪也向当时在北戴河的林彪、叶群报告了情况，林彪说：“吴胖子放炮放的好！”关于会上的争论，张春桥会后立即报告了江青，江青又详报了毛泽东。

在文革中，颂扬毛的话是人人都在喊的。周恩来在1966年5月21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也说过：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毛主席和列宁一样是天才的领袖，是世界人民的领袖……。“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三个副词，本都是颂扬的词语，这里所说的“天才”一词根本不是哲学概念，不是唯物论和唯心论的问题；这里所说的“天才”一词，根本不是宣扬人类中有不经过实践就有的天生之才；这里所说的“天才”一词，与汪东兴在本书中大力颂扬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和世界历史上罕见的”、“伟大的”、“最伟大的”、“前所未有的”、“无与伦比的”（汪书第3页）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同时，汪东兴也用了与林彪同样的副词“创造性地”（汪书第4页）。请问汪东兴，你又是什么用心呢？

四天之后，8月17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由周恩来总理主持，对《宪法修改草

案》最后定稿。然后，提交九届二中全会讨论。会前，军委办事组特别召回了在外地检查工作的李作鹏，以加强战斗力量，在会上跟张春桥斗。周恩来估计会上要斗起来，也做了思想准备。周恩来是支持林彪和军委办事组的。周总理的想法是，这些评价是正确的，最起码不过分，写就写上嘛，张春桥又在人为添乱。周恩来最讨厌人为添乱，使正常工作难以进行。

但是，出人意料之外的是，会上根本没有争起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在会上一言不发，张春桥坚持的意见也不坚持了。带有这些词句的《宪法修改草案》被顺利通过了。周恩来松了一口气，认为一场风波暂时平息了。但是，通过设不设国家主席一事，毛、林的不同意见，拿上了桌面，推到了前台。周深知毛是不会轻易原谅别人反对他的，毛要整林是势在必行的。但毛是不是要抛弃林，是不是对林要很快下手，周还在观察之中。

林彪却紧了一口气，认为到庐山（九届二中全会）会有更大的斗争。他太了解毛泽东了，他知道张春桥反常的态度是毛泽东给他支了招。林也深知得罪了毛，毛是不会罢休的。但是，斗争不能不进行，这不是个人的安危问题，而是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问题。毛在寻找战机，然后抓住战机，打击林的人，从而削弱林，支持张春桥。林彪也想抓住战机，打击张春桥，从而削弱中央文革，从而削弱“极左”路线。这样才有条件给文革降温，好建议毛泽东尽快结束文化大革命。文革再这样搞下去，非亡党亡国不成。

1959年4月，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主席以解脱事务性工作，多考虑党和国家建设、发展的理论问题为由，由刘少奇接替毛泽东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让出了国家主席一职，当时可能是情愿的，可为时不久他就不情愿了。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主席被搞到了极为难堪的地步，毛尝到了分权给别人的苦果，他在寻找机会夺回这个权力。

在“文革”中，毛泽东打倒刘少奇的愿望实现了。当时，“文革”进行了多年，人心极盼安定。大家认为，1969年召开了党的“九大”，党的问题解决了，1970年召开“全国四届人大”，再解决国家和政府的事情，国家有了健全的体制、领导干部有了具体的分工，党和国家才能逐步走上正确的轨道。在文革中，大量的工作都落到周总理身上。周是非常惧怕毛、屈从毛的，对江青也是难以置信的恭敬，周看着毛的眼色，勉勉强强用了余秋里、谷牧两个人（后来谷牧也没保住），几百个国务院部长及部级干部，一个不敢用。一直到1968年2月，在国务院系统的四十二个单位中，“部长级干部站出来工作的只有九十人，占总数二百八十人中的百分之二十。其中第一把手（部长、主任）只有三人，其他统统靠边站了（48）”。周从来不敢向毛主席提出让他的部长们出来工作或让部分部长出来工作，反而多次向军队要干部，形成粟裕、苏静、李震、李水清、李耀文、陈绍昆、邱国光、孙正，白相国、沙风、伊文、尹承贞、范子喻、赵正洪等军队干部当国务院部长的境况，连周总理的国务院办公室主任丁江，也是周总理本人亲自从总后要去的。

召开“四届人大”，必然涉及到“国家主席”一事。毛泽东心里极不愿提“国家主席”这个词，因为原国家主席刘少奇已经被毛泽东打倒，被扣上“叛徒、内奸、工贼”的帽子，1969年11月被残酷整治而惨死（当时，此事绝密到只有毛、林、周、康、汪知道。想想看，我们的党和国家已被毛搞乱到什么程度）。毛泽东内心深处还是有点虚，因为，在“四届人大”会议上，关于国家主席刘少奇的问题是无法向全国人民交代的！

设国家主席是一个国家基本的正常的体制。当时社会主义国家的体制如此，资本主义国家的体制也大都如此，全世界基本都如此，设国家主席是国家体制健全之所在。毛泽东竟然由他个人的心思就改变了国家体制，他竟提出不设国家主席。在此背后，毛泽东是用“国家主席”这张牌，保自己的“命”，扼林彪的“底”。毛泽东极不严肃、极不认真地想搞一种不伦不类的

国家体制，在来访外宾中，重要的人物他见一见，其他人物让周恩来总理去见。在文革中，周总理日理万机，工作满载超轴，大大超过身心负荷（毛主席从来心疼周恩来，直到周恩来病重，该动手术时，毛不同意，仍然批示：保守治疗。关于周恩来被延误治病，汪东兴也欠着周总理的账，是真正有罪的）。

为此，1970年3月8日，汪东兴赶回北京，在政治局会议上第一次传达了毛泽东主席关于“国家主席”问题的意见：主席提出“在宪法中不要设国家主席这一节，如果大家坚持要设国家主席，我是不再当国家主席了，这个国家主席也只有林彪同志来当”。那天，汪东兴非常兴奋，专门对叶群说：“你赶快回苏州，把这个消息亲自告诉林副主席。”散会后，汪东兴余兴未尽，还特意把黄、吴、叶、李、邱约到他中南海家中侃大山（还一起吃了红薯），大家问起主席究竟是不是这么讲的？汪说：“主席的的确确是这么讲的！”

此后，虽然关于“设国家主席”问题，关于“谁当国家主席”问题，意见不够统一，但8月22日，在庐山召开的常委会上，最后研究这个问题时，康生、陈伯达、周恩来、林彪都提议设国家主席，是四比一的绝对多数。最重要的是康生是在大会开幕式的主席台上，以政治局常委的身份，以中央宪法修改起草委员会负责人的名义，直截了当地拥护林彪的讲话，直截了当的提出“如果主席不当国家主席，那么请林副主席当国家主席”！康生的讲话和汪东兴三月八日在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主席关于“国家主席”问题的意见是一致的！！

毛泽东不是说“设国家主席”是林彪集团的政治纲领吗？可康生是在大会主席台上第一个宣读了这个纲领！毛泽东不是说“有人看我年纪老了，快要上天了，他们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吗？康生是第一个帮助林彪“分裂党，急于夺权的”呀！毛泽东不是说“这次庐山会议是两的斗争个司令”吗？怎么康生、陈伯达、周恩来都跑到林彪这个司令部来了？！8月22日的常委会，他们三人都提议设国家主席；8月23日的开幕式上，康生直截了当地提出让林彪当国家主席；8月24日上午周恩来带领全体中央委员听了两遍林彪讲话的录音并决定讨论；8月24日下午，陈伯达、汪东兴两个重炮手，在华北组开炮；政治局候补委员李雪峰等人签署了六号简报，第二天就发出，全会升温，抨击“四人帮”；当日下午汪东兴印了《语录》并散发给军委办事组；吴、叶、李、邱在各自的小组讲“天才”，讲“三个副词”；接着是许世友、韩先楚、杨得志三个司令员给毛主席、林副主席写信；同时，许多中央委员联名（或以个人名义）给毛主席、林副主席写信。……

我们且不说“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哪里摆？”这句话是谁发明的。这句话远远没有康生“如果主席不当国家主席，那么请林副主席当国家主席。”分量重！康生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是毛泽东的大亲信，是江青的大军师，是中央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负责人，康生是在九届二中全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向全体中央委员讲的！有了康生这句话，什么陈伯达、汪东兴、黄、吴、李、邱和所有在庐山“犯错误的人”都是小巫见大巫了。毛泽东怎么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呢？我们不禁要想，毛泽东所谓六次讲不设国家主席的“历史故事”，真不真实呢？毛是不是说的这么明确呢？是不是这么泾渭分明呢？是不是那么水火不相容呢？还是后来为了政治斗争的需要而编造的呢？就像毛泽东1966年给江青的信一样。毛泽东说过国家主席“可以叫董老当”，“可以从工农兵中选”，那林彪为什么就不能当呢？

林彪是同意设国家主席的，林彪的意见是正确的。1970年4月11日，由秘书口述，他向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主席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一、关于这次‘人大’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同志仍然建议由毛主席兼任。这样做对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人民的心理状态适合。否则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二、关于副主席的问题，林彪同志认为可设可不设，可多设可少设，问题都不大。三、林彪同志认为，他自己不宜担任国家副主席的职务。”

4月12日，周恩来接到林彪的意见后即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多数人都同意林彪的意见。在政治局会议上“多数政治局成员同意仍由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周恩来对此也没有提出异议（49）。”毛泽东知道林彪关于设国家主席的态度后，感到意外，这是在对毛个人崇拜登峰造极的时候，第一次有人反对他的意见，而且是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当政治局的意见报到毛泽东那里后，毛立即否定了政治局多数成员的集体意见，当天就做出批示：“我不能再做此事，此议不妥。”为什么不妥？毛泽东一句不谈，也不“谆谆教导”大家。政治局也不知道毛泽东肚子里的“鬼胎”究竟是什么。周恩来还诚心诚意地提出，“如果设国家主席，今后接见外国使节等外交礼仪活动时，可由国家主席授权别人代行。”其实，重要的外事活动毛泽东都参加了，该见的几乎都见了。因此，提出设国家主席也是从当时的实际情况考虑的。

4月25日，毛竟坐专列亲自到苏州去看望住在那里的林彪。毛、林二人有说有笑，“非常投合”。毛泽东还特别说道：“我就是信任革命了几十年的红军干部，我就是信任军事办事组这几个跟我出生入死几十年的红小鬼。”事后，叶群立即把毛的话转告了黄、吴、李、邱。这样更坚定了他们与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斗争的决心。

其实，林彪上了毛泽东的当。毛泽东对林彪提出设国家主席的意见非常恼火。想到林彪在文革初期，在九大前后的态度；想到林彪对江青的蔑视；想到林彪对文革中的大事，表面拥护，事事应付的态度，毛泽东已经不想要林彪了。

毛泽东主席开始了一系列进攻。4月下旬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借用《三国演义》中的典故来解说他不当国家主席的理由：“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火炉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当孙权。”7月中旬，中央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在京开会，会上不少同志仍然提出设国家主席。为此，毛泽东又一次提出“设国家主席，那是形式，不要因人设事。”

毛泽东自以为得计了。没想到在九届二中全会开幕前（8月23日开幕），8月22日下午3时，在毛泽东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上，除毛泽东外，四个常委都同意设国家主席并由毛泽东担任。在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只有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是不同意设国家主席的；九届中央委员会，几乎全体中央委员都是同意设国家主席的。中央向各地征求意见，全国各地反馈回来的意见都是同意设国家主席的，即全国人民都是同意设国家主席的。更有甚者，毛泽东的“家奴”汪东兴，在会议发言中慷慨激昂地说：“热烈希望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建议在宪法中恢复‘国家主席’一章，这是中央办公厅机关的愿望，是八三四一部队的愿望，也是我个人的愿望。”

这使毛泽东大为恼火。他不但没有对此慎思，还是下决心“反潮流”，反“党和人民”的潮流了。

关于在宪法序言中，要不要写三个副词的问题，根本不是问题的实质。写上怎么样？不写上又怎么样？关于设不设国家主席的争议，也不是问题的实质，同意设国家主席怎么样？不同意设国家主席又怎么样？双方争议的实质是路线之争。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一伙，是执行和坚持毛泽东在文革中的“极左”路线的。林彪、周恩来、军委办事组、政治局大多数同志一方面是敬重毛泽东，一方面又要遏制这条路线再任意发展的，是要降温的，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恢复正常秩序，解放老干部，团结老干部的。在执行这条路线中，打消江青一伙的嚣张气焰，抑制他们的狂妄，瓦解他们抱团结帮，军委办事组冲在前头，林、周是支持的。周恩来是很倚重军委办事组办实事的。

早在“九大”以前，1968年3月，黄永胜到北京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兼军委办

事组组长后，就坚决站在林彪、周恩来一方，对维护大局、维护稳定、“加强战备”、“抓革命促生产”起了重要作用。黄永胜协助周恩来做了大量的工作，对于支撑处在全国动乱、全面内战的国家，呕心沥血，夜以继日地工作。尤其可贵的是黄永胜在反对中央文革的极左路线，反对江青专横、擅权的斗争中是旗帜鲜明的，他是一个带头人，起到了周恩来不便发挥的作用。周恩来有时不得不和点稀泥。有一次林副主席很动情又很担忧地对黄、吴、李、邱说：“还是那句话，对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主席搞什么就让他搞吧，但军队不能乱，军队稳定了，地方乱一点，天塌不下来；军队乱了，就不得了了。军队是绝对不能让他们（指江青一伙）进来捣蛋的。”黄永胜在抵制江青，不许她插手军队也是立了大功的。江青对黄永胜恨之入骨。

党的九大以后，开始由中央政治局领导党中央的日常工作了，中央文革碰头会取消了。中央的日常工作，在周总理的领导下，由政治局会议研究解决，重大问题报毛主席、林副主席批示。中央决定不再用中央文革的名义发文件，也告知江青等人，不得再用中央文革的名义讲话。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这些人是非常不满的，他们总想抱成一个小团团，占领一块阵地。他们总是提出一些与周总理、与军委办事组、与国务院业务组、与政治局其他同志相左的意见，来表示他们的马列主义“水平”，来表示他们的“革命性”，来表示中央文革的意见还存在。这无疑对党的事业干扰极大，危害极大。

比如，在解放干部的问题上，本来国务院和各地方干部可以解放一批，但江青、康生、张春桥是极力阻挠的，到1970年初也只解放了几个人。由纪登奎提名解放他在冀鲁豫工作时，自己的老上级万里、赵紫阳。周总理、邱会作立即表态同意解放万里，黄永胜支持解放赵紫阳。万里被任命为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江青一伙极力反对，但快开四届人大了，主席也发过话，他们也无奈，但江青说不要万里留在北京，总理说万里对北京较熟悉，先让他下放一段时间，接触一下群众再工作。这样万里任北京革委会副主任，在首钢下放劳动一段时间；赵紫阳被任命为内蒙古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军委办事组也报了不少干部，被江青、康生、张春桥一伙一压再压，最后确定的有杨勇、张宗逊、梁必业、张震等人。吴克华因被毛泽东主席点过名，大家有些顾虑，是黄永胜一直坚持，才榜上有名的。为解放军队干部，军委办事组多次召开会议，黄总长等做了重要讲话，让各单位加快清队步伐。黄说：“多是熟悉的人嘛，心胸放宽了，政策就放宽了。不要抓住不放。”黄是积极解放老干部的。一个“九一三”事件，把黄永胜和军委办事组的功绩全抹杀了。

有一次，周恩来、江青、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汪东兴在一起，江青指着鼻子骂黄永胜，诬陷“黄永胜是搞军党论的，你们不要党的领导。如果军队要党的领导，就请黄总长向主席、林副主席建议，让我担任军委副主席。军队的事由我向主席报告，肯定能得到主席的支持。”黄永胜毫无惧色地，当时就顶了江青，黄说：“我可不去，谁想当谁向主席去建议！”江青听后勃然大怒，周恩来左劝右劝都不成，后来江青又哭了起来，黄永胜没有耐心看江青耍泼，站起来就走了（50）。

在林彪的领导下，在周恩来总理的支持下，军委办事组和全军指战员反对造反夺权，反对打砸抢，已卓有成效。军队先以驻京的总参、总政、总后三总部及海军、空军，各军兵种为龙头稳定下来，从而稳定北京，从而稳定全军，从而稳定全国！以军委办事组领导的陆、海、空三军革命派是立了大功的，人民解放军已成为支撑人民共和国的顶梁柱。这段历史，已经因林彪的倒台被扼杀，被篡改了。

既然军委办事组与中央文革路线分歧这么大，同时，军委办事组对江青极不敬重，江青产生了极大怨恨。因此，以军委办事组为代表的军队革命派说东，以中央文革为代表的文革造反派，偏偏说西，以示他们的对立，这才是问题的实质。两方的关系是相当紧张的，军委办事组

可以说是反对中央文革、反对“四人帮”的先驱了。遗憾的是毛泽东主席支持了江青、张春桥一伙，说坚持“天才”，就是坚持唯心论的先验论，继而又说“天才”、“设国家主席”，是“反党的炮弹”，是“反党的政治纲领”，搞得人有言难辩。谁坚持正确的意见，提议设国家主席，毛就给谁扣上有“野心”“自己想当国家主席”的大帽子。与毛泽东的意见不一致那就是你自己错了，别无选择。

实际上林在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上“顶”了一下毛泽东的错误！坚持了设国家主席的正确意见。正如真正德高望重的黄克诚同志所说的，敢与毛泽东顶嘴的，一个是彭德怀，一个是林彪（毛泽东异曲同工，使两人先后在庐山落马）。在“文革”中，林彪不止是在一件事上顶了毛泽东，为了扼制毛泽东的无政府主义的极左思想恶性发展，林做了大量工作，这方面的事实是很多的，而且总有一天会“上市”的。不管林彪在文革初期怎么支持过毛，但是，当他认清毛这样干下去，对党、对国家、对人民的极大危害后，他敢于反对毛的错误。为了维护毛的威信，他才拿张春桥开刀。林彪是真正英雄！

举几个例子：

1966年8月1日，毛泽东主持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要在会上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议》，并改组中央，把刘少奇搞下台。林彪不愿掺和此事，躲在大连不回来，毛泽东可离不开林彪，几次打电话催他回京，并派吴法宪、汪东兴把他接回北京。

林彪不准许军队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还提出“骂不还口，打不还手”的政策。毛泽东不高兴，提出：“不介入是不可能的，人民解放军要支持左派广大群众”。毛泽东让军队“介入”，让军队支持“左派”，林又说“要一碗水端平”。

林彪不希望军队院校和地方院校串联把局面越搞越乱，让解放军三总部、各军、兵种把各自下属的院校到京的学生劝回到原驻地去，就地闹革命。毛泽东却煽了一把火说“军队院校么么么（一百一十一所），的确有妖。”号召军队院校起来造反，踢开党委闹革命。

江青想出风头，要批周扬、田汉、夏衍、阳翰笙“四条汉子”并得到毛主席的首肯，江青还拿出鲁迅的话来做批判周扬的依据。林彪坚决反对，说“不要搞这么多名堂”。这样，在部队系统就没有轰轰烈烈地搞什么批“四条汉子”。

在“文革”中，毛泽东、江青都点了煤炭部部长张霖之同志的名，因而造反派有恃无恐，1967年1月22日，张被造反派活活毒打而惨死，死后全身只穿一条衬裤，被扔到东郊火化场，背上几十处刀伤，脑后有一血洞，在脖子和背后，已凝的血结成一条鞭子状。林彪得知后非常震惊，他托当时的七机部长王秉璋同志对张霖之同志的惨死向其家属表示慰问（王曾是十七军司令员，张是政委），尔后又顶住江青的干扰，接见了张霖之同志的夫人，并和周总理一起支持邱会作儿子和张霖之女儿的婚事。事后，林彪联想到文革中这么多老干部受挫，伤心地落起泪来，林说：“他（指张霖之同志）被毒打致死，说明他没有屈从造反派，没有屈从她（指江青）。”

七机部王秉璋部长也被造反派斗的死去活来。无奈之中他去向林副主席求援，王对林说：“林总，我愿意接受革命的考验；我应该接受群众的帮助。我并不是怕群众，但是，我几乎天天都在坐‘喷气式’，弯腰下跪挂黑牌子，实在有些吃不消。”其实，王也只不过给老首长发发牢骚，没想到林彪勃然大怒：“法西斯！惨无人道！他们就是想把老干部都搞死！”尔后，林又说：“你住到西山（军委前指）去。不要出来，避避风潮。”

国防工办副主任赵尔陆被造反派羁押在办公室，几天不得回家。赵在受批斗后回到办公室，筋疲力尽，心脏病发作而惨死，人死后手上的烟头还在燃，把手都烧焦了。”林听到赵的死讯，潸然泪下。立即派叶群去看望赵尔陆的夫人郭子瑞同志，并把郭子瑞同志接到毛家湾休息。郭子瑞对林副主席说：“怎么革命了一辈子倒成了反革命，走资派！？”林斩钉截铁地说：“不要怕戴帽子，走资派是党内问题，应该在党内解决。”

在文革中，林彪的心情十分矛盾，应该说林是拥护毛主席“反修防修”，“继续革命”的。但毛太看重自己，太随心所欲了，太放纵江青了，毛泽东内心对自己太个人崇拜了。（“四个伟大”，毛并不讨厌！如果在六二年的七千人大会上，人们喊“四个伟大”，毛是决不会讨厌的。现在，经过全党的努力，毛已经“四个伟大”了，毛又说“四个伟大”讨厌，叫人无所适从）。林担心物极必反，希望适可而止，可毛又听不进任何人的话，毛打倒了那么多自己的老战友，还表现得那么轻松、潇洒、满不在乎，扬言文化大革命还要搞十次、二十次、三十次。林彪内心甚苦，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文件，林看都不看，毛已经定了还看什么！？只要毛在文件上批了“照办”的，林就让秘书代笔“完全同意主席指示”，只要毛划了“圈”的，林就让秘书代为划圈。林认为文革搞到这个份上，该“克己复礼”（克制自己的欲望，恢复党和国家的正常体制和正常秩序）了，毛却认为打倒了刘少奇后，还要“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继续搞斗、批、改。林彪在九大报告中，让陈伯达强调提出恢复经济、抓革命、促生产，被毛泽东、江青斥为唯生产力论。尔后，毛泽东让康生、张春桥、姚文元重新起草“九大报告”。这个报告提出继续“革命”，继续“斗”，继续搞“运动”，号召“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不提什么是文化大革命最后的胜利。汪书第17页写道：“由于林彪对九大的政治报告改用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稿子不满，在九大开幕式上，他是照着稿子念了一遍，敷衍了事”。在笔者看来，林彪真是高明。

历史证明，毛主席提出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是不对的，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四个中央常委和政治局多数同志及大多数中央委员提出设国家主席的意见是正确的。对于毛泽东的错误之处，也只有林彪才敢提出，才敢坚持正确意见。当然林彪在文革中也有错误。人们说，周恩来在“文革”中说的错话、做的错事是违心的，同理，林彪很多事情上也是违心的。

“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那里摆”这样耸人听闻的话，这样“有味道”的话，本是1970年八月19日，毛主席到达九江时，汪东兴对前来迎接毛主席的东道主，江西省革委会主任程世清谈的话，告诉程按这个调子发言。东窗事发后，汪东兴却无耻地把这句话转嫁给叶群。叶群是林彪的妻子，问题显然走味了。跟随林彪多年的卫士长李文普同志，在《中华儿女》杂志一九九九年第二期中说：“如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哪里摆？我们没有听到叶群讲过。”

我们也采访过吴法宪，他过去在威逼之下，把汪东兴说过的话，安到叶群头上。汪自己干的事自己心里最明白。汪编造了历史、搅混了真相。“九一三”以后，由“四人帮”控制的中央文件公布了这一所谓“力证”，欺骗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

在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林彪作为毛泽东主席的接班人被写进了党章，已经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他根本不觊觎国家主席这个虚职。他并不认为国家主席是个肥缺，如果林彪真有野心，他愿意为野心去拼命，那他应该设法去夺党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的大权嘛！这个毛泽东都不当的国家主席，毛泽东都不要的“权”，林彪是不会去争的。对林的攻击，纯属无稽之谈。林早就提出要“克己复礼”。设国家主席也是“复礼”。可是，直到今天，汪东兴仍然用毛泽东的“两个凡是”对林彪的正确意见进行恶毒攻击。

李文普说“从林彪口中，我们倒听到他讲过连副主席也不愿当。他不仅这样说，也还有让毛主席当主席，他不当国家副主席的交待，我记得是叫于运深秘书写的（51）。”“他特别不喜

欢同外国人打交道，这话同我讲过。在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上，毛泽东不愿意接受属于国家主席职责范围的礼仪往来活动，林彪更不愿意出头露面接见外宾。林彪曾说过‘跟外国人说话要特别注意，不管你说什么，他们都会给你登报发表的。’毛泽东曾让林彪接见斯诺，他拒不接见，主要是外国记者爱把事情捅到报纸上。”

林彪是井冈山下来的中央主力红军的领兵统帅。林彪是百战不殆，解放了大半个中国的开国元勋，人们都了解林彪的实力，林彪也了解自己的实力。即使林彪什么职务也没有，他仍然是相当有实力的人物。林彪参加了创建第一支人民武装的南昌起义；林彪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坚持井冈山艰苦卓绝的斗争；林彪在江西中央苏区，领导红一军团在五次反围剿的斗争中屡建奇功；林彪在湘江血战中几乎捐出血肉之躯；林彪在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带领红一军团斩关夺隘，爬雪山、过草地，强渡大渡河，奇袭泸定桥，智取腊子口……战绩卓著。林彪是红军中一只年轻的鹰！林彪在抗日战争中，率领八路军一一五师，首战平型关，向日本法西斯打响了第一枪，重创日本关东军，大大提高了中国人民全民族的抗日斗志；林彪领导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从东北的辽沈战役，直至平津战役、渡江战役、衡宝战役、广西战役、步兵乘渔船渡海打败蒋介石的美式军舰直取海南岛，解放了大半个中国；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时，各路英雄都来参加庆典，北京是歌舞升平。惟有林彪元帅在党中央、毛主席“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号令下，仍在硝烟弥漫的枪林弹雨之中指挥衡宝战役并取得辉煌胜利。全国解放后，林彪最有资格据功争权，但林彪却急流勇退。据说林的房内有他的亲笔条幅“学范蠡，急流勇退”。林称病休息，从不争功，从没有什么“野心”。尽管如此，在1956年党的“八大”时，林仍然当选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尔后，又当选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党的副主席。1959年，毛泽东搞倒彭德怀后，明令林彪主持军委工作，要把军队大权交给林彪。林拜见主席，表示“林彪不才，能力和身体都难以胜任”，毛主席执意让林彪干，林推辞了三次，才承受下来。

如果说林彪想当国家主席，林彪是完全有资格当国家主席的！他也能代表党和人民当好国家主席。接受递交国书，接见外宾，参加国宴，举举手，签签字，盖盖章，比井冈山的斗争，比五次反围剿，比万里长征中斩关夺隘，比抗日战争首战平型关，比解放战争的辽沈战役、平津战役、衡宝战役、解放海南岛容易得多。林彪为什么就不能当国家主席？！为什么林彪当国家主席就是有野心呢？那么以后的国家主席李先念、杨尚昆岂不也都是野心家了吗？

（注：“九二”全会到“九一三”的情况，待续）

注释：

（1）指1971年8月23日至9月6日，在江西庐山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二中全会（2）徐景贤《十年一梦》，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

（3）《张闻天庐山冤案与康生》，张培森。《南方周末》，2001年3月8日。

（4）斯诺《与毛泽东会谈》，美国《生活》杂志，1971年4月。

（5）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6）《中华儿女》2004年7月总第206期，程中原《邓小平一锤定音 胡乔木再度复出》。

（7）程世清同志访谈记录，2004年7月。

（8）程世清同志访谈记录，2004年7月

（9）摘自《周恩来传》102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

（10）摘自《周恩来传》102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

（11）摘自《周恩来传》102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

（12）1969年5月17日，江青在钓鱼台11楼找黄、吴、李、邱、李德生、谢富治、张春桥、姚文元等人谈话。此次谈话的内容，是专门谈周总理的“问题”，江青对周总理进行了恶毒的攻击。黄永胜当场和江青顶起来，黄、吴、李、邱立即宣布退场，去向毛主席告状。毛竟不以为然。邱也随即到西花厅告诉了周总理。周含著泪，握著邱的手说：“老同志就是老同志！

老同志就是老同志！”

〔13〕陈晓农《陈伯达遗稿——狱中自述及其他》，第118页，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书中说“在庐山全会正式开会之前，林彪个人单独在一个房间同毛主席谈话，周恩来同志和我及其他人，都在另一个房间等待，时间并不很短（叶永烈在此加注：又据别人回忆，叶群当时守在走廊上，以防“十一楼”闯进去。“十一楼”亦即江青）。毛主席和林彪单独谈话以后，大会开了。”

〔14〕高文谦访问吴法宪谈话记录。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第291页。书中说“开大会前，常委在后面休息室闲谈，林彪问主席：我想讲话行不行？主席问讲什么？林彪说听吴法宪讲，在讨论宪法修改草案时发生了争论，张春桥不赞成国家机构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还说赫鲁晓夫天才地发展了马列主义，我想讲讲这个问题。主席听了后说：这不是张的意见，是江青的意见，是江青在背后搞的鬼。你可以讲，但不要点张的名字。”

〔15〕周恩来在北戴河同林彪的谈话记录，1971年3月30、31日。摘自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第315页。

〔16〕丁盛将军（九届、十届中央委员）访谈纪录1995年9月。

〔17〕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第296页。

〔18〕中共九届二中全会第一次全体会议记录，1970年8月23日。摘自《周恩来传》1018页。

〔19〕周而复《往事回首录》，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年10月。书中写到“张春桥是山东华蒂社的中坚。华蒂社是个什么组织呢？复兴社是国民党特务组织，华蒂社是复兴社领导下的团体”。

〔20〕徐景贤《十年一梦》，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

〔21〕邱会作将军访谈记录，1989年7月

〔22〕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是：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叶剑英、叶群、朱德、刘伯承、江青、许世友、张春桥、吴法宪、李先念、邱会作、李作鹏、陈锡联、姚文元、黄永胜、董必武、谢富治，纪登奎、李雪峰、李德生、汪东兴。

〔23〕吴法宪将军访谈记录，1986年9月。

〔24〕XXX将军访谈记录，九届中央委员，1992年5月。

〔25〕XXX同志访谈记录，九届中央候补委员，1998年5月。

〔26〕邱会作将军访谈记录，1989年7月。

〔27〕王秉璋将军访谈记录，1996年5月。

〔28〕吴德《十年风雨记事》第117页中说，“汪东兴跟著（陈伯达）讲了话，主要意思是设国家主席，由毛主席担任国家主席，他也讲了有人反对毛主席的问题。当时，陈伯达讲话，大家还有疑惑，汪东兴一讲就不同了，他是毛主席身边的人，别人更多地相信他的讲话。”

〔29〕徐景贤《十年一梦》第208页写到：“陈伯达讲完话后，拿到那份《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的汪东兴，也跟著发言。本来是他向政治局传达过毛泽东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指示，但是，现在在全会发言时，他却提出了要设国家主席，由毛主席担任国家主席；他还讲了有人反对毛主席的问题。他们两个人一讲话，华北组的讨论马上升温。”

〔30〕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第295页，香港明镜出版社。

〔31〕《周恩来传》第1013页，中央文献研究出版社。

〔32〕许寅：《访原空五军政委陈励耘》。

〔33〕许寅：《访原空五军政委陈励耘》。

〔34〕摘自叶永烈著《陈伯达传》一书，第494页。

〔35〕XXX对吴旭君同志访谈记录。

〔36〕丁盛将军访谈记录，1995年11月。

〔37〕邱会作将军访谈记录，1989年7月。

〔38〕吴法宪将军访谈记录，1986年9月。

〔39〕李作鹏将军访谈记录，1992年5月。

- (40) 邱会作将军访谈记录, 1989年7月。
(41) 徐景贤《十年一梦》, 第206—208页, 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
(42) 《周恩来传》第1022页, 中央文献研究出版社。
(43) XXX同志(九届中央委员, 参加了华北组小组会)访谈记录, 1996年5月。(44) 罗英才《陈毅的非常之路》第290页。
(45) 叶永烈《陈伯达传》, 第503页。
(46) 1967年1月21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部分来京军事院校学生时的讲话。(47) 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 当代中国出版社。
(48) 《周恩来传》第993页, 中央文献出版社。
(49) 《周恩来传》第1012页, 中央文献出版社。
(50) 邱会作将军访谈记录, 1989年7月。
(51) 《中华儿女》杂志一九九九年第二期。

~~~~~  
【人物春秋】

试论文革中毛泽东、周恩来、林彪和江青的角色

• 游 侠 •

最近出版的高文谦的书“晚年周恩来”栩栩如生地勾画出文革中的中共各个主要政治人物, 通过这本书读者可以清晰地把握到除周恩来以外各人在文革中的心态和角色, 反而对书中的主要人物周恩来, 作者并不知怎样(或故意没有)评价。本文试论毛泽东、周恩来、林彪和江青在文革中的角色, 以便读者更好地理解文革和文革中的中共各个主要政治人物。

文革是毛泽东针对党内所谓的“走资派”或“潜在的‘赫鲁晓夫’”而发动领导的, 这一点已经很明确。毛泽东惧怕他死后党的未来领导人抛掉他的旗帜, 更怕给他来个鞭尸, 因此想通过文革根除这种令他坐卧不安的可怕的可能性。因为毛泽东在大跃进中遭到惨败, 历史给了刘少奇一个充分表演个人才华和治国理念的机会。躲在所谓的二线的毛泽东看到了绝大多数人是如何与他志不同道不和, 而刘少奇又是一个多么可怕和危险的对手。所以刘少奇在文革一开始就成为毛泽东的主敌, 毛泽东不择手段地斗倒他并在肉体上消灭他, 而决不手软。或者我们可以说刘少奇和以他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路线”是以毛泽东为主人和驾驶者的“文革号”这辆战车的主敌, 而其他人都可以在这辆战车中找到他们的角色。

正如以上提到的, 毛泽东是这辆战车的主人和驾驶者, 他永远操纵着这辆战车; 他的目的就是文革, 就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直到所有中国人变得和他那样彻底, 中国不再有修正主义的危险。就像所有的车辆那样, 为了能够开起来这辆车需要油门和刹车, 所谓的左派即林彪江青是这辆车的油门和动力装置, 而所谓的右派即周恩来是这辆车的刹车。看来毛泽东和周恩来对于这点从一开始就有默契。高文谦在书中指出毛周之间并没有什么个人友谊或个人关系, 他们两人只是在事务上通力合作; 而周恩来在文革中做出的种种保护老干部和国民经济的所谓“好事”都是按照毛泽东的意愿或者默许做出的。只要毛泽东明确表示打倒某一个人, 周恩来是绝对不会反对的, 相反他会毫不犹豫地抛出那个人并在多数情况下亲自操刀。这并不是说周恩来完全同意毛泽东的观点, 不过作为一个公众人物, 周恩来接受历史的评价时他的心理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他的所作所为。同时如果毛泽东暗示某个人可以保护, 则周恩来就全力执行, 并且在毛泽东认可的范围内抓经济。这即是说毛泽东是把周恩来当作文革中配合主力部队的力量来使用, 冲锋陷阵的主力仍是林彪和江青。或者我们可以说周恩来和林彪江青同属文革派, 都是“文革号”战车的不可或缺的零件, 林彪江青是战车的油门, 而周恩来则是战车

的刹车。

用这种眼光看文革，问题就变得很清晰。只要各个零件安分守己，发挥自己的功能，则文革号一切正常，它该冲就能冲该停就能停，运转“良好如意”。其实在成熟的西方政府中也有充当两种不同功能的人物，即鹰派和鸽派。总统如意指挥两派，不时看情况轮换采纳两派中的一派的意见，使政府安全健康地运转并执行总统的执政理念。当然文革号和成熟的西方政府是有巨大的差别的，文革的整个方向就极端荒谬，给国家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灾难；只是在执行行政首脑的意图的方式上，文革号和西方政府也有很大的类似性。无论是在文革号还是在西方政府中的人物都不会因为自己的观点而丢位置（脑袋）的，当然前提是他必须绝对拥护行政首脑的领导并个人有能力充当他的角色。问题是毛泽东并没有点破这一点，看来在众人中只有周恩来完全明白毛泽东摊派给他的角色。

林彪正因为对各人在文革号中的角色没有完全看懂，同时又对毛泽东的荒唐程度估计不足，才遭到失败。当刘少奇一派得到肃清后，林彪天真地想改变文革号的运行方向和自己在其中的角色，而在毛泽东的计划中这些都应该由他本人来决定，其后果当然是林彪一派遭到彻底的整肃。江青一派也因为看不到这一点而冲得过猛和协调不好同文革号内其他人的关系，屡屡遭到毛泽东的批判。后来邓小平复出后，或许因为看不懂这点，又或许因为不甘成为毛泽东手中的零件，才再次与毛泽东闹翻。唯有周恩来对这点无比清楚，又同时因为他的个人能力，充当起刹车的角色来还是绰绰有余，所以他在大风大浪中始终稳立不倒。

如果毛泽东仅仅是一个心怀荒唐理想的行政首脑，周恩来还可以潇洒自如地应付各种局面。但毛泽东同时还是一个心地无比阴暗的恶徒，这就注定了周恩来悲惨的命运。毛泽东清楚地知道自己的个人能力是远远不及周恩来（也远远不及刘少奇）的，同时在党内和国内外周恩来受到的爱戴也远远超过自己，自己的优势只是枭雄的胆色和没有底线的下流手法。因此毛泽东在内心深处对作为自己臣子的周恩来嫉妒得要命。高文谦的书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因为周恩来在中美外交中发挥的作用而得到国际社会的赞誉，毛泽东出于嫉妒心理大批外交上的投降主义路线。同时周恩来在民间受到的爱戴，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普通人不懂他在文革号中的这种角色，只看到他抓经济保护老干部的一面；而毛泽东则不象普通人，他对周恩来的为人和一切所作所为无比清楚，因此在心理上又极端鄙视他。连只见过周恩来几面的李志绥大夫都看不起周恩来的人格，更何况是与他相处几十年的毛泽东。嫉妒和鄙视的双重心理使毛泽东仇视周恩来，同时又因周恩来的个人才能无人能代替，毛泽东又不得不找回理性，事事重用他。当毛泽东对周恩来的嫉妒和鄙视超过理性时，毛泽东请出邓小平和抛掉周恩来。以前我们对七十年代末的毛周邓的关系不甚了了，现在托高文谦之福可以看清楚了：毛泽东抬出邓小平来代替周恩来抓经济充当文革号的刹车，同时给周恩来赐死。周恩来被毛泽东整死了；可是邓小平的抱负不仅仅是充当另一个周恩来，因此与毛泽东发生冲突只是早晚的事情。毛泽东再次打倒了邓小平，可是他本人也在全国人民名为悼念周恩来实则反对毛泽东的怒吼中惊慌死去；邓小平再一次复出，终于引导中国走出荒唐的年代。

~~~~~

【难忘岁月】

《风雨人生路》摘载（之十）

• 刘文忠 •

毋忘国之耻

我“二进宫”后关进108室，有幸遇见同牢房的复旦大学教授潘世兹先生，使我对“文革”中的大学，增进了实际感受而又永世难忘的见识。潘世兹教授是在“文革”开始不久被抓捕进一所的。

潘教授告诉我：66年11月7日，复旦大学召开斗争王造时、潘世兹大会，孙大雨陪斗。在大会上，红卫兵危言耸听、诬陷王、潘两教授组织了所谓“反革命政党”，并胡说孙大雨也参加了这一反革命组织。其实潘教授与王造时早已是至交密友，即使都被打成“大右派”后，潘教授也与他相知往来。这全属于大知识分子之间的知己真诚，与共产党讲究的阶级斗争、政治路线毫无关系。可是激昂慷慨的造反派们与冲锋陷阵的红卫兵小将，一个个登台揭发他们的所谓“狼狈为奸，阴谋复辟，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一派胡言乱语，把谎言重复多次似乎成了“真理”，激起了广大“革命师生”的无比愤慨。王、潘、孙这些大教授脾气耿直，秉性倔强，面对种种诬陷不实之辞，坚决抵制与还击，绝不“低头认罪”。可怜的老教授们被个个强硬揪摁脑袋，强逼他们长时间九十度弯腰，甚至被自己的学生拳打脚踢，几次被“打翻在地”。众所周知，能考取、攻读复旦大学的都是些学业品德优秀的莘莘尖子，然而在这“文革”的疯狂年代，他们中不少人受“阶级斗争觉悟”的深度熏陶而兽性潜滋暗长，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与政治环境中充分暴露无遗，貌似有文化知识素养的大学生却在残酷作践学问高深的教授老师，这正是史无前例的人间悲剧。

昔日优美的复旦校园，庄严的“登辉堂”，舒畅的教学大楼，“燕圆”的小桥流水，一幢幢欢乐的学生宿舍，绿茵如织的大草地，学子练身的大操场，静谧的知识宝库图书馆……一变以往“向科学进军”的琅琅读书声，成了红卫兵冲冲杀杀的大战场，成了残酷批斗、肆意践踏、疯狂摧毁中华民族知识精英的活地狱。在“文革”高潮的日子里，复旦大学所有名望闻世的教授学者，几乎无人幸免“漏网”，各人戴着高帽子，而且双手必须扶着头上这三尺亡魂之冠，在操场上、校园里游斗示众。这批大知识分子的每人背上各贴着一方白纸，写明“地主”“反革命”“大右派”“反动学术权威”……等等不同字样。红卫兵们为了增添乐趣，博得围观人们满场哄笑，强迫教授学者们唱“自骂歌”：“我是大右派x x x，我有罪，罪该万死，死了喂狗，狗也不吃，喂给猫吃，猫都嫌臭！”又强逼他们唱“群众专政就是好，牛鬼蛇神跑不了，我也跑不了！”还喝令他们唱《黑帮歌》：“我是牛鬼蛇神，我是牛鬼蛇神，人民对我专政，我要老老实实，我不老老实实把我砸烂！砸烂！”教授、学者中谁不老实自骂自唱，红卫兵就挥舞皮带向他背上、头上、腰上、肋上狠毒地抽打，每次总有几位被打得鲜血淋漓、眼青鼻肿！潘教授就挨过多次皮带抽打，甚至残忍逼令他们在操场上像狗一样爬，说是还牛鬼蛇神禽兽的真面目。可怜他二百多斤重的胖壮身躯从学生裤胯下钻过去！但对这些自己一手教育的学生、今日红卫兵如此凶神恶煞亵渎恩师的邪暴劣行，他若有所思地说：“我不恨他们，我知道教唆他们犯罪的是谁！他们是无知、愚昧，但愿有一天他们能醒悟，还有他们的同龄人。如果他们永不醒悟，中国早晚必亡！”潘教授越说越激愤，“世界寰球，只有中国是这样，而且是红太阳升起、照着的中国！在每个省，每个市，每个县，每个镇，每个学校，每个单位，在同一段时期内，用高帽子、挂牌羞辱着数十万、上百万人于阳光之下，采用非法私闯民宅、抄家没收，强暴数十万户家庭于宪法之下，岂但史无前例，而且世无双例呵！岂但是‘人之羞’，而且是‘国之耻’！自古道‘足寒伤心，民寒伤国’。人民寒心，国家何堪？问题是，人民寒不寒，国家伤不伤，于那些发动这场‘文革’运动的人有鸟事！可是，中华民族、炎黄子孙可要永远毋忘这是国之大耻啊！”潘教授伤心万分、感慨跺脚地说着，双目炯炯闪光。他几乎忘记了个人的安危，因为就在这次批斗大会后他与王造时、孙大雨等一起被抓进了上海第一看守所，身关牢狱、丧失了人权自由的他，满怀愁虑的还是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

有一次潘世兹教授悄悄地对我耳语：“现在我懊悔留在中国在复旦当一位教授，为何过去我一点也不了解毛主席对知识分子的态度会如此尖锐？”这是他全然了解我的身世、辉哥遭难以及我多日来对他们两位牢友长辈辛勤服务、坦诚相处，把我彻底反对“文革”的观念和盘托出

后，潘教授直言同我探讨时局了。“我始终弄不清楚，毛主席为什么要对知识分子，特别对高级知识分子采取那般极端的斗倒斗垮、践踏人性和人权的做法呢？”潘告诉我，毛泽东在1920年9月给黎锦熙的信中说：“我一生恨极了学校，所以决定不再进学校。”毛是一位自学成才的伟人，但在教育与受教育的问题上，历尽了坎坷，受尽了歧视，所以他鄙视大学和高级知识分子。世界从古到今哪个开明的君主和文明国度不尊重知识分子，尤其尊重高级知识分子。象‘文革’这样搞下去，中国还会有希望吗？”他愤愤不平地说，“在高校提倡阶级斗争的目标是谁？斗争对象，自然不是工友，不是学生，不是年青的助教、讲师，而是我们这些教授、学者。每次运动起来，我们就会心惊肉跳。尽管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对统治者一再表忠心奉承，但却一再遭受白眼，一再挨打耳光。我想不到哪个兴朝盛世这样糟蹋知识分子的，我也不晓得我们知识分子究竟造了什么孽而遭致这么大的祸殃！中共所有的报刊杂志上写到，报告会上提到，只要触及知识分子，必然戴上帽子‘旧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很少偶尔不戴帽子，对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打着用、骂着用，叫千千万万为国家为民族缔造文化文明的知识分子成天用泪洗脸，战战栗栗过日子，这是何苦呢！中共历次运动中总是声色俱厉地说，要把旧知识分子的‘臭架子’打掉，毫不顾惜知识分子也是人，也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何况是最讲人格尊严的炎黄子孙。这次‘文革’一来，中共挥舞着更大更粗更残暴的棍子，要把整个知识文化界一个不剩地打死、毁灭掉，一个国家消灭了知识分子，犹如一个人丧失了精神思维，岂不成了行尸走肉，国家整个岂不要顷刻瘫痪、灭亡？这是多么危险、愚蠢的统治手段啊！”我对潘教授的过分忧国忧民想法并不完全赞同，因为辉哥生前一再告诉我，中国知识精英是镇压不光的，总有勇敢斗士起来抗争，总有聪明智士躲避锋芒，保护自己，从秦始皇开始历代封建帝王焚书坑儒，华夏知识文化仍在发扬光大，垮台的，毁灭的只有独裁者的暴政。我还举例说“马思聪不是逃脱厄运了吗！”潘教授感慨声声附和：“马思聪太幸运了！太幸运！我们很多高级知识分子在57年受冤枉批斗后，还以为这是新社会的偶然现象，总以为整个新中国是光明的，在那时并没有被痛苦压倒，反而自我责备反省多多，希望通过思想改造跟上毛的步伐。其实这正是中国知识分子天真的表现，殊不知毛的‘阶级斗争纲领’，就是要赶尽杀绝有独立人格能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其结果硬是把原来对共产党没有二心的人活生生打出二心来，把原来冒险从国外归来投身新中国建设的大知识分子，一个个被硬逼得再冒险逃出国去。这是历史的悲剧，也是国家的耻辱啊！”

“特殊”的囚徒

小说《红岩》中写到，国民党设在四川歌乐山的白公馆监狱中，有位高级政治犯黄先生，在里面享受特殊的待遇，有报纸、书籍看，牢饭吃小灶……。巧合得很，在我关入108房后，发觉同关的潘世兹教授与那位姓黄的资深干部，生活上也享有“特殊待遇”，他们两位的监饭吃的是“中灶”，即每顿中餐、晚饭都有荤菜，与我吃的通常烂菜皮、霉老卜，每周仅星期五午餐有块小肉的大灶牢饭截然不同。尤其是潘教授，不仅每餐有鱼有肉，还能吃到家属送进来的当时社会上也很少见的进口食品，如进口奶粉，巧克力，以及其它高档的营养品。这是我二次在第一看守所四年多中所看到与听说的最特殊的一个囚徒待遇。

相处日子久了，相互间都有比较深刻的了解。潘世兹教授出身于旧社会的卖办大资产家庭，家产富誉上海滩，祖上还是江南著名的古籍版本藏书家之一，听他说其中宋、元、明、清版本许多价值连城。解放初，继承了富裕家产与大量珍贵古籍的他，积极拥护共产党，热爱新中国，他把家产的大部分与全部藏书捐献给了国家。可是在57年反右期间，潘先生仍未逃脱打成右派的厄运。他身材魁伟高大，体壮重达200斤左右，可惜患有严重的糖尿病，必须隔天注射治疗糖尿病的特效名贵进口针剂胰岛素，据说不打此针会发生生命危险。监狱中医生发扬人道主义，对他相当照顾。每月15日，他夫人必来探监，给他送进口奶粉、巧克力、牛肉干、熏鱼干、核桃肉……。每次接到他恩爱夫人送来的东西，他总眼泪流淌，沉默许久，心神怏怏许久，他有几个女儿，听说夫妻琴瑟恩爱。

潘先生告诉我，他之所以能享受如此特殊囚徒待遇，可能同他早年给国家许多捐献有关，或许市里有些老领导尚未忘记旧情（其实老领导统统早已被打倒靠边了），又说这些都是他生理上需要，都是讲人道的监狱医生决定的合情合理措施，他是名牌大学教授，出名民主人士，身子又有严重疾病，不这样能活下去吗？对于这一点，同牢干部老黄说到点子上：我们这种犯人，关押在这里，实际成了个“档案袋”“材料库”，他们（办案人员）不会随便让我们死去，他们要从我们嘴里敲出更多办案线索，以挖出更多的政治犯。潘教授认为，且不管他们用意何在，在监牢中吃得好些，养好身体，活一天算一天，总比被饥饿折磨的面黄肌瘦、奄奄一息，甚至丢掉老命为好。所以他平日里不断地吃“零食”，加营养，牢房已坐了多年，体重却没有轻下来，用他的话说“至今总算还未掉下一块肉”。但是他也有担心，甚至内疚，因为他的生活待遇与普通犯人的差距确有天壤之别，难免引起同监犯人的妒忌与自己内心的不安。他告诉我，以前曾相继有二个犯人，都因不满他的这种特殊，日里常常欺侮他，夜里，看他熟睡后，悄悄爬起来，轻手轻脚偷他的营养品吃。他早上起来发觉包里的好吃东西少了许多，向门外看守报告，看守进来总是不分青红皂白，对他与别人都训斥一通，说他是“无理取闹”，说偷吃的人“馋死了！贼性发作。”看守出门后，偷吃的犯人反而恼羞成怒，对潘教授谩骂“诬告”，并动手动脚要打他。耿直的潘教授索性吵着要找训导员评理。后来陆续把那两个偷吃者调房了事。老黄干部插话说得好：“跟老潘同牢房，需要有一种修养，食欲上要有自我克制与忍耐。”潘先生随即指着我称赞：“小刘是个好青年，有家教，有修养，我们相处很融洽。”

我对潘、黄两位老犯人都尊重，每天开饭时还主动帮他俩拿这拿那，对他们吃中灶不但不妒忌，反而劝他们多吃点，养好身体。为了打发牢房中沉寂无聊的时间，我与潘先生互相约定，每天讲二个小时的故事。我主要讲苏俄文学，如高尔基、屠格涅夫、托尔斯泰、普希金、奥斯特洛夫斯基等人的文学作品。而潘先生主要讲欧美作家的名著故事。他陆陆续续讲了雨果、巴尔扎克、梅丽美、大仲马、小仲马、杰克·伦敦、马克·吐温等人的作品。我不仅要他讲作品内容，还要请他对作者作介绍，对作品的现实主义与世界影响作分析评价。他都乐意任教，讲起来头头是道，如数家珍。他与我一老一少，天天沉浸在外国文学的海洋里，他那燃犀洞察的高智卓识，令我钦佩之至。我想自己无福分去复旦大学外国文学系课堂上聆教，有幸在监狱里遇得大师，不失为“祸兮福所倚”了。说老实话，在外国文学领域里，尽管我在辉哥生前指导下涉猎不少，但与这位外国文学大师相比，我真是“小巫见大巫”了。我不仅肚子里外国故事绝比他少，而且缺乏分析评价的真知灼见，“关公面前舞大刀”、“班门弄斧”，只能“耍赖”，重复讲、“炒冷饭”，或胡乱七拉头、八拉脚，凑些趣事搪塞他。潘先生对我特别宽容，明知我如此，也不点穿我，笑呵呵地听我编造瞎说。在旁的老黄干部似乎也听得津津有味、专心致志。这样一来，似乎忘了在牢房。一天天难熬的寂闷日子飞快地过去了。其间我曾一心想请教潘教授教我英文，他早年毕业于圣约翰大学，并在国外留学多年，他的英文水平也够大师级，可惜当时牢房条件恶劣，牢里没有纸笔，加上潘先生毕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以免引起看守来找麻烦，影响他的“特殊待遇”，所以几次向他求教都告无成。就这样，我们几乎每天消磨在外国文学故事声中，听到牢房外伙司员叫喊“开饭噜”才停讲。

“特殊待遇”的潘教授，毕竟已身为囚徒，照样遭受种种人格凌辱。有一次抄监看守进房来检查“狱规”，一开口就训斥他“特殊化”、“吸血鬼资本家”，“坐牢还价舒服”！他们把潘先生所藏的瓶瓶罐罐高级补品乱翻一通，凶狠地散扔一地，还恶狠狠地毒骂他“反动的吸血鬼，不得好死！”潘先生被他们凌辱得脸上一阵白一阵红，苦楚尴尬莫名。抄监看守走后，他一边收拾地上的补品一边眼泪汪汪地说：“我病得这样严重，吃点自家买的东西，是医生允许的，可这帮人却无半点人道，人性也给狗吃了！”记得有一个月的15日，潘先生没有接到夫人送来的食品、药品，他担心家中又出事了，妻子是否也隔离审查了，急得他在牢房中团团转，白天吃不下饭，夜里睡不着觉。他天天叫我帮他分析，为什么妻子不来？我极力安慰他，叫他耐心等待。他向医生打听，医生也不理他。他拼命打报告，要求见审讯员，结果又给看守乱骂一顿，并当

场把他的报告撕得粉碎狠丢在他脸上，横蛮地警告他“不准再写报告，再写就揍你！”听医生说，隔天要打针的进口胰岛素快用完，潘先生急得差点发疯。过了几天，审讯员来训斥他“不老实，隐瞒了重大问题”，威胁他必须“彻底交代”，否则断他的食品接济。潘教授被逼得没法，不得不进一步“上纲上线”“深挖细掘”，写了厚厚的一迭纸“交代”，才算又获得了以前的“特殊待遇”。老黄干部悄悄对我说：“你看，所谓‘特殊待遇’，就是逼你作‘特殊交代’！”说着苦笑莫名地摇头叹息。

一天深夜，睡梦中的潘先生突然惊叫起来，吓得我与老黄都闹醒。第二天我问他为啥夜半惊叫吓人？他说：“这段日子老做噩梦。昨夜我梦见红卫兵和造反派都长着一身毛，张开血盆大嘴要吃我。我在梦中向他们求饶：‘已经缴械投降了，认罪服罪了，饶了我吧！你们何必杀气腾腾，像虎狼那样嚎叫着吃我呢？’吓得我天旋地转，倒在地上。他们好象猛虎般扑在我身上，用锋利牙齿啃咬我头颅。我哀求他们开恩，‘这头颅不是钢铁做的，经不起你们啃来啃去！’谁知他们就是不肯停嘴，吓得我嚎啕大哭……”潘先生无限伤心地继续说：“小兄弟，不瞒你说，自从66年我被批斗后经常做这类噩梦。我满心伤痕就是从那时来的，我的病也是从那时开始的。五年来多少个日日夜夜，我一直在想，人为什么会变成野兽？我始终不理解文革为什么要把人变成了兽类，说难听些就是把人变成了狗，像狗一样的听命于主人，像狗一样的摇尾乞怜，像狗一样的不知羞耻，还有许许多多像狗一样的厮咬同类。”不久，复旦工宣队来人找潘提审，他们自称是潘与王造时“反革命政党项目组”人员，责令他在一周内写出一份从祖宗三代到文革抓进一所为止的自传体交代。我为潘先生高兴，对他说，可能案子由市局下放到复旦，有希望放回学校去改造了，可以回家见到你日夜思念的夫人与女儿了。潘教授由此确实信心很足，一连写了二万多字。交出去五天后，就被叫去提审。据垂头丧气回房的他说，那两个工宣队员拍着桌子怒吼“不行！不行！”得重新写过，并责令他“老实交代罪行，不准替自己树碑立传”。他十分艰难地说：“既然要写三代简历，我总得实事求是写，我与父辈确实对共产党作过贡献……”这样一个月先后他写过三、四次，每次都受他们训斥“不行”，凶横逼令他“再深刻交代”。后经老黄与我给他点拨、开导，他的“深刻交代”才算勉强通过，然而天天盼望“释放回校”的他，却是望眼欲穿，音讯渺茫。老黄不愧为党内老干部，对此谙熟其深奥，他对潘先生解释道：“办案人员所要的‘深刻交代’，一是要从交代中找出一些与前所写的某些不一致的地方，作为继续逼供的突破口；二是，也是更主要的，从交代中找到‘外调’的线索，可让他们公费出外游山玩水。那些工人临时组成的所谓‘工宣队’，多么想利用这次文革体验一下审讯犯人的威风与到全国各地游名胜、出风头的机会。”果然，随着外调的不断“深入”、“过细”，像潘教授这样背景复杂的“特殊囚徒”，解决原来案由的希望，早被不断袭来的新问题所搞砸了，哪有可能尽快释放，而留给他的惟有坐牢兴叹，享用一点“特殊补品”罢了。

本期编辑：
华新民（美国）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思语（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CND》总编：
陈天寒（美国）

投稿专用地址：hxwz@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